

“乞讨女官员”为何让人如此感动?

今日视点

人的感情，往往会在强烈的反差之下喷薄而出，同情心亦然。贫困县女官员为给儿子治病上街乞讨，无疑就是一条能催生足够同情心的新闻。

这名女官员名叫雷仁粉，曾是文山州西畴县民政局副局长。半年前，她儿子李万宇不幸患上白血病，社会各界给予了母子俩不少捐助。然而，对于30万骨髓干细胞移植手术费用来说，这些捐款仍是杯水车薪。她带儿子在北京治病期间，一度抛开官员的面子上街乞讨。

(7月14日《都市时报》)

在突然袭来的灾难面前，雷仁粉和无数普通百姓一样无助——她卖掉了房

子，花光了积蓄，借遍了所有能借钱给她的亲戚朋友，甚至，她也幸运地得到了不少社会捐助，但她仍然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在病魔的折磨下一天天消瘦下去。到最后，她不得不带着自己的工作证上街乞讨。这个时候，雷仁粉不是官员，她只是一个无助的母亲。

但“官员”和“上街乞讨”之间的强烈反差，还是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在成千上万的网络留言中，网民们在对雷仁粉表达同情和捐助意愿之余，最强烈的感慨就在于——官员尚且如此，普通百姓怎么办?这在叩问我国家医疗保障体系巨大漏洞之余，折射出了人们强烈的焦虑和不安。这种焦虑

感，也是大家被“官员母亲上街乞讨”感动的根源。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公务员尤其是官员，是保障最完备的群体。这个群体，向来是与贫困、无助没有什么关系的。但现在，雷仁粉以官员的身份，却在病魔袭击面前，不得不跟普通人一样在命运中无助沉浮。她的上街乞讨，更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将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漏洞，赤裸裸地展示在了人们面前。医疗保障的漏洞，将一个副局长推上了街头行乞，如何会不令千千万万的普通百姓心生强烈不安和焦虑?人们感动于雷仁粉的母爱，何尝不是忧心于自己未知的命运——在不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之下，每个人都可能是无助的受害者，甚至收入稳

定、保障较高的官员也不例外，这就是残酷的现实。

是的，官员尚且如此，普通百姓怎么办?这是一个沉重的问号。人们希望，雷仁粉的无力能够让国家的医疗保障体系有力起来;希望每一个共和国的公民，都能在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保护之下，免于“花钱治病”的现实威胁。这样的一种社会心理，感动于雷仁粉的坎坷际遇，更应该成为国家尽快建立全民大病医保体系的推动力。好在新的医改方案很快将公开征求社会意见，但愿新的医改方案能够充分吸纳民意，加入“建立全民大病医保体系”的明确条文，以制度的力量消弭人们的强烈不安和无力感。

(本报评论员 赵勇)

从现在开始，把“民调”当个宝

热点纵论

两条民调新闻：一条是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对3232人的一项民调显示，25.4%的人认为火车退票费不合理，30.8%的人认为电信、电力、石化等垄断部门的乱收费现象最严重(7月14日《中国青年报》)；另一条是：中组部已委托国家统计局从今年起每年在全国开展组织工作满意度民意调查(7月14日《新京报》)。

“民调”对国人并不陌生。一些国家遇到重大问题时，媒体往往进行民调。

而当政者也总是非常在乎民意支持率，民调结果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变化，往往都会让他们惊恐不已，进而调整政策，遏制民意支持率下滑。其实，国内也有民调，像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就经常搞类似调查，每次也能引起舆论关注，但仅仅是舆论关注而已。因为我们的民调不会对官员产生决定性影响，所以民调结果往往不被重视，他们只是出现在“3·15”晚会和新闻报道中。因为我们的民调结果没有决定性的价值，所以，很少有人在乎民调。可以肯定，

这次中国青年报社调中心的民调，虽然又引起关注，但老百姓反响强烈的问题仍旧得不到解决。

我们对民调程序和民调结果的轻视，在一些方面已经让我们付出了惨重代价。发生在瓮安的“6·28”事件震惊全国。事实上，如果瓮安有民调，因移民搬迁、矿权纠纷、房屋拆迁等引发的不满反映到民意支持率上，还会演化成群体性事件吗?但就是因为没有民调程序，没有民调结果，贵州高层无法掌握瓮安党政负责人的民意支持率，也就无法依据民意支

持率对瓮安的领导层采取适当措施。

现在，中组部委托国家统计局开展民意调查，显然是重视民调的举措。在我们现有的体制下，民意不可能直接左右官员去留，但完全可以让民调结果通过影响上级决定下级官员的去留，民调同样可以有意义。如果我们重视民调的意义，那么，就不妨让我们从重视诸如不合理收费的民调结果开始吧。如果我们要更加听取民众对政府和官员的意见，那么，就真正把民调当成宝吧。

(王攀)

不要留下“闹事才赔偿”的印象

【媒体思想之曹林专栏】

陕西府谷县近日通报了“司机被交警追逐跳河”及由此引发的警民冲突和砸砸事处置情况：10名相关人员受到处理，其中1名当值协警涉嫌玩忽职守罪被刑拘，死者家属共获赔偿款39.98万元。

(7月11日《西安晚报》)

这是一个语焉不详、让人费解的处理结果。处理不可谓不严厉，赔偿不可谓不高。可问题在于，以什么罪名、依据什么规定处理10名警方人员?在此案中他们扮演了怎样的“相关角色”?另一方面，死者家属得到的近40万元的高额赔偿款是怎么算出来的，依据了哪些法律，40万包括哪些赔偿?

如果这些信息不公布，不以法律语言向公众解释清楚，很容易给人留下“以严厉惩处平息民愤”、百姓一闹事官方才赔偿”的暗示。这种“一闹无理、一闹就赔偿”的暗示，会引导人去信仰拳头、暴力，而不是依赖法律。

再来分析府谷官方的这个通报。警方称：交警在公路上执法检查时，发现一辆隐藏牌照并违规载人的农用车。车主贺立旗此前因无证驾驶曾被多次拘留和处罚，他下车逃跑时被交警追趕，跳入黄河。事发后，情绪激动的死者家属将棺材抬至交警大队门口，后引发了一场群体性事件，少数社会闲杂人员借机煽动群众闹事。从这个通报看，责任纯粹在车主贺立旗和“少数社会闲杂人员”身上，警方既没有乱罚款乱收费，

也没有违法行政。既然警方没有责任，为什么要处理相关人员?为什么给予一个为了躲避警方依法检查而跳河溺死的车主这么高的赔偿?自相矛盾之处，很容易让人感觉警方既想隐瞒事实又想平息民愤，而不是依法处理。

有网友依据“陕西人身损害赔偿计算公式”进行了计算，加上丧葬费、死亡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等等，贺立旗至多能得20万赔偿，为什么会是40万?这40万不是政府官员出，最终要摊到每个纳税人头上，不能让纳税人稀里糊涂地埋单。更重要的是赔偿的性质问题，到底是依法作出的赔偿，还是为了息事宁人、堵死者家属的口而作出的赔偿。如果赔偿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百姓自然会以为赔偿是“闹事”闹出来的，从而会受到“闹事政府就会赔”的错误激励。

出现群体性事件，本就是法治失控的表现，公众的正常维权路径受堵，有话无处说有理无处讲，或者预期到法院告也告不赢”，只好选择“闹”的抗争方式寻求解决——面对这种失控的“闹”，政府更应该在法律框架内治理，公布真相，厘清责任，严格依据法律作出处理，用法律语言给一个让公众心服口服的解释，重塑公众对法律的信仰，重树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否则的话，政府的处理脱离法治轨道，社会“越闹问题越能得到解决”的印象会不断得到强化，闹的情绪会不断传染，这个社会将会面临无休止的麻烦。

(作者系《中国青年报》编辑)

本版邮箱：wfwcbyh@vip.sohu.net

热烈祝贺格尔森地板荣获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

实木地板 158 元/m² 起售

格木 760*122*18 厂家直通车价: 218 元/m ²	楠亚木 910*95*18 厂家直通车价: 228 元/m ²	圆盘豆 910*122*18 厂家直通车价: 248 元/m ²	李叶苏木 900*120*17 厂家直通车价: 268 元/m ²
--	--	---	--

全场产品大放“价”

1、凡活动期间购格尔森地板的用户均赠送踢脚线(杉木)(特价产品除外)

2、凡活动期间购格尔森实木地板50平方以上的用户，均赠精美工艺足球1只

即日起，接受团购报名，抢购热线**85062163 85062424**

格尔森郑重承诺：

- 此次参与活动的地板均为格尔森正品出厂的产品；
- 此次参与活动的地板均符合国家标准所规定的各项要求和指标；
- 此次参与活动的地板均享受格尔森优良的售后服务承诺；
- 此次活动期间购买地板的用户均为格尔森的终身客户；
- 免费上门办理安装零星退货和不足补货；
- 免费上门打蜡服务1次；
- 免费跟踪使用和回访，四季温馨提示。

